

# 「自由·民主·多元」三位一體

● 劉軍寧

Michael Novak: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2nd ed. (Maryland: Madison Books, 1991).

邁克爾·諾瓦克 (Michael Novak) 所著的《民主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1982年在美國問世，旋即在全世界各地產生了廣泛而持續的回響。該書陸續在阿根廷、巴西、葡萄牙、法國、意大利和韓國等地出版了譯本。波蘭的團結工會也在1986年把該書印成地下出版物。由於受該書的影響，「民主資本主義」作為與(民主)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相對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在概念上已被普遍認可。自1982年以來，在澳洲、香港、美國、捷克、意大利、波蘭、英國、美國和幾乎每一個拉美國家都舉辦過以民主資本主義為主題的研討會。該書於91年在美國、92年在英國又出了第二版，

作者對正文未作更動，本文只是加了一篇後記。

諾瓦克的「名氣」很大，哈佛出身，兼思想家、神學家、作家、外交家於一身，熔政治、經濟、倫理、宗教思想於一爐，現任美國著名思想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社會政治研究部主任，屬美國政治思想界的領航人物。本文只回顧他的「思想」。

按照海耶克的分類，資本主義是自發的秩序，社會主義是設計的秩序。對資本主義的描述多半是回顧性的，故其理論往往顯得有些跟不上實踐。在對社會主義的描述中，理論又往往領先實踐太多，問題尚未出現，方案就已想好，例如，許多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在探討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上就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口舌。作為一個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在總體形象上似乎一直是支離破碎的。在一定意義上，直到

作為一個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在總體形象上似乎一直是支離破碎的。在一定意義上，直到《民主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誕生，我們才獲得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立體三視圖。

國民財富增加的奧秘不在於該國擁有多少天然資源，不取決於國家的政治地位，不靠人口的多寡，不靠生產資料是否歸國家所有，也不靠周密的計劃經濟，而是靠人的創造力的經濟體制，和相應的政治體制和道德文化體制。

《民主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誕生，我們才獲得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立體三視圖。

諾瓦克認為，民主資本主義是這樣的一種三位一體：一是以市場為主導的自由經濟體制，它以自由競爭為基礎，通過法律來把個人的自利納入對他人的利益和公益有利的軌道，並以此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貧困問題；二是尊重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權的民主政治體制，它注重從憲政制度上通過分權制衡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防止權力的濫用；三是體現自由和正義理想的道德文化體制，蘊涵其中的是多元、開放、寬容，但同時又充滿活力的現代精神氣質(ethos)。換句話說，民主資本主義集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位於一體。對這三位的具體內涵及其相關性，作者又是作何解釋的呢？

## 自由市場經濟

經濟生活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環節，其目的是生產盡可能多的財富，從而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因此，衡量經濟體制的標準首先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財富的創造。越能致富的體制當然就越優越，也就越有助於維持人類生存這個共同的福祉。所有的經濟體制都建立在相應的財富觀，即財富的性質和來源的看法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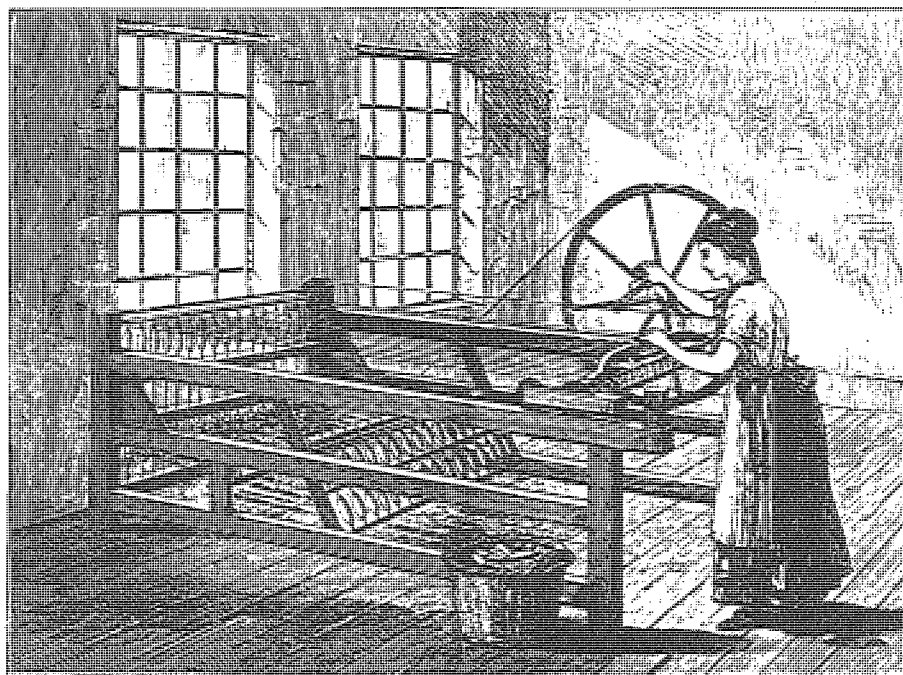
財富來自何處？造成財富增值的原因是甚麼？有人說，自然資源多，國民財富就多。而自然資源貧困的瑞士、香港、台灣、日本卻比

許多資源豐富的地區，如中國大陸、前蘇聯富裕得多。若是財富真的來自資源，為甚麼擁有同等資源、或地理人文條件相類似的國家在富裕程度上卻極其懸殊？如南北韓、東西德之間便有此差距。可見，這些外在的東西並不是財富的根本來源。

財富是甚麼呢？諾瓦克援引亞當·斯密的回答：財富來自人的創造力。創造力是人類特有的天賦。人類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其創造活動的產物。人類創造財富的活動從未停止過，只是在一些社會制度下創造得多些，在另一些社會制度下創造得少些。人類的創造力水平相差無幾，然而，國家間的貧富差異卻如此懸殊。造成這些差異的顯然是來自制度上的差異，而不是來自創造力上的差異。

由此可以斷言，造成普遍貧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對人的創造力的壓制和扭曲。所以諾瓦克認為，國民財富增加的奧秘不在於該國擁有多少天然資源，不取決於國家的政治地位(如獨立還是殖民地)，不靠人口的多寡，不靠生產資料是否歸國家所有，也不靠周密的計劃經濟，而是靠人的創造力的經濟體制，和相應的政治體制和道德文化體制。

決定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最關鍵的因素是經濟體制，而愈合乎人之本性的體制愈能有效地釋放人的創造力。由於財富的源泉來自人的創造性，因此，這種經濟體制必然是天然的自由制度。這種制度把權利交給個人，讓個人自己去創造財富，而不是靠國家由上至下地去限



財富來自人的創造力。

制他們創造財富。每個人只要心智正常，都是天然的創造者。在絕大多數人的一生中，其創造的遠要多於其消費的。以國家為單位而言，個人的創造之和大於個人的消費之和，國家的財富就由此增加了。斯密的財富觀表明，最重要的財富在於人的頭腦之中，在於人所掌握的技術、文化和人的習慣及其首創精神之中。

最原初的資本是人力資本，最高級的資本是心力資本。人力與心力加上解放人力與心力的天然的自由經濟體制，是創造經濟奇迹的密碼和致富的必要基本條件。資本主義是建立在資本基礎之上的，而其拉丁語源中，資本(capital, caput)恰恰指的是頭，引申為頭腦和心靈。頭腦、心靈、創造力是資本，這既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又是其道德基礎。因此，在諾瓦克看來，資本主義學說最合乎、也最能

證明財富來自人的創造力這一財富觀。

在破譯了財富的密碼之後，下一步要作的就是找出最有利於釋放人類創造力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滿足並體現這種先決條件的經濟制度肯定最能釋放人的創造力。那麼，這種先決條件是甚麼呢？根據我對該書的歸納，先決條件有兩個：第一，這種經濟制度必須為創造者正當地佔有創造成果提供有效的保障；第二，必須為創造者最大限度地提供創造財富的自由。

就第一個條件而言，若是公民通過辛勤勞動所創造的財富不斷被政府強制充公，他們在創造財富上就不可能有很大的熱誠。人們只有在有權正當佔有勞動成果時，才會放手去創造財富，這就要求政府公開地承諾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保障。

私有財產權不僅是一種物質的

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市場經濟離不開民主政治，沒有市場經濟的民主政治只能是「極權的民主」。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結合為人類打開了通向富裕社會之門。

權利，而且還是一種精神的權利。人類自由的表達要求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物質工具，類似「恆產」與「恆心」之間的相互依賴。財產權把權利授給個人，把限制和約束加諸國家，即限制國家的權力。在這種意義上，財產權關係到社會的正義，而不僅是只對有產者個人有利的社會正義。它否定了侵犯個人自由的正當性。沒有財產，個人的行動和趨善的傾向就會嚴重地受到限制，因此，與通常的指責相反，私有制有助公益，而公有制則有違私利。

就第二個條件而言，公民若是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也就沒有創造財富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創造出大量的財富，來使社會的總體財富有所增加。同時，佔有創造成果的權利和創造財富的自由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那種由政府安排及至壟斷經濟活動的作法只能導致創造力的泯滅和國民的貧困，一方面要為人民尋找天堂，同時又把私產當作萬惡之源的意理就難掩其虛偽了。可見，創造的自由要落實到社會制度上就必然表現為自由的市場經濟。

## 民主政治體制

財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還必須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則就會被統治者的濫權所踐踏。不僅如此，財產權還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牢固的道德基礎。眾所周知，絕大多數人都不是藝術家，他畫不出令人讚嘆不已的落日餘暉，但卻能夠挑出一種

他鍾意的顏料來粉刷他家的牆壁；他不能把黃泥塑造成維納斯，但是，卻能夠用泥土在他家周圍築起泥牆。在後一層意義上，他仍然是藝術家。因為他能像藝術家一樣作其所擇，即按照自己的選擇行事。就像畫家選擇畫風景不畫人物一樣，他可以選擇對自己的財產作任意的處置。運用財產的藝術是民主的藝術，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有所作為。

書中論證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市場經濟離不開民主政治，沒有市場經濟的民主政治只能是「極權的民主」。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結合為人類打開了通向富裕社會之門。德國與日本在戰後創造的奇迹是民主帶來財富與繁榮的生動寫照。相比之下，對私產與經濟自由的剝奪則封閉了市場，保護了特權，偏袒了懶惰，禁錮了創造力，從而帶來了普遍的貧困和落後，使富國變窮，窮國更窮。而出路只有一條：市場經濟，加上民主政治。

從常規的觀點看，在西方，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不過是出自歷史的偶然。然而，作者卻認為，這種結合是歷史的必然。民主政治只能與市場經濟相融合，民主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非但不是相互衝突的，相反倒是相互強化的。資本主義的天然邏輯導致政治民主，因為沒有政治自由的經濟自由從本質上講是不穩固的。經濟上獲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因此，只提供部分自由的威權政權總有向民主政治演變的傾向。另一方面，不承認有必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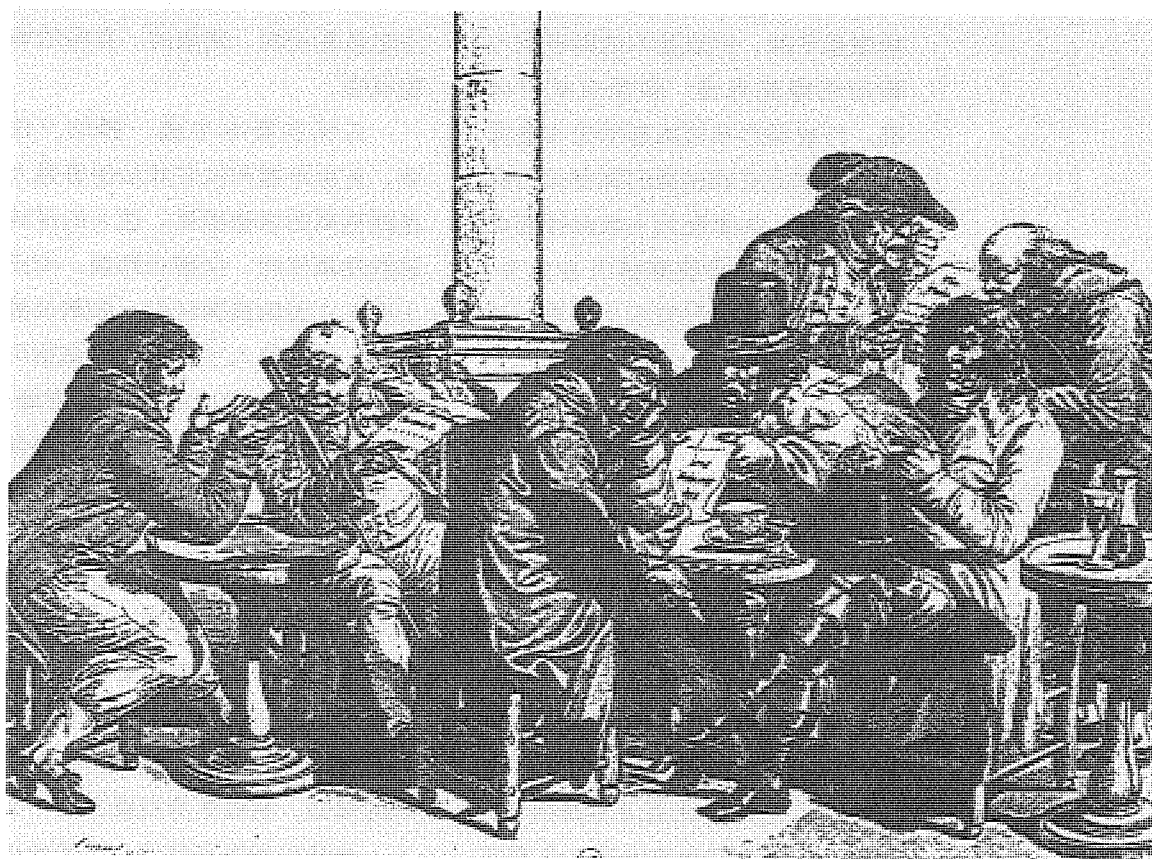
經濟領域限制國家權力的地方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經濟領域的自由，從而破壞了釋放創造力的條件。因此，近代的民主和資本主義起源於相同的歷史脈動。在發明出制度形式來實現這些脈動之前，它們就已經具備了道德形式，其目標是：(1)限制國家的權力，以防止政治專制和經濟停滯；(2)解放個人和社會的創造力。

單純從經濟上講，自由資本主義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的長期存在則是必不可少的。在作者看來，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注定是劣質的資本主義，甚至會蛻變為法西斯主義。作者認為，這也正是他與韋伯在對資本主義看法上的差異。民主使得政治權力能夠以和平、理

性和有規則的方式定期得到更換，從而使市場秩序不致受到破壞。因此，民主政治僅僅表現出尊重產權、經濟自由和市場的誠意是不夠的。真正落實這一點還須通過法治、分權制衡來約束國家的權力。

古典自由主義者及像諾瓦克這樣的當代傳人始終擔心民主政治會釋放暴民心理，蛻變成無政府狀態，最終又以專制告終。所以，民主政治在戰勝個人專制後又面臨着一種新的專制的威脅，即多數的專制，特別是道德多數的專制。民主不是簡單的多數原則，任何民主如果不表現出多樣性就會受到威脅。民主的生存要靠促進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會產生相互對抗的利益，各種產業和技術之間都會構成競爭和衝突。利益越分散就越

資本主義使人的能力商品化，但同時又釋放了人的創造性。



沒有經濟上的能動性就沒有民主的共和國；沒有維持使所有的人都能受益的持續的經濟成長就不可能贏得人們對民主的愛戴，民主也就難以地久天長。穩定而長壽的民主國家都建立在牢固的自由市場經濟之上。

過去的道德家們強調理想、目標和動機，然而，諾瓦克指出這樣一個悖論：越要取得較高的道德成就，就越要降低道德說教的調門，不去強調動機和目的。

不容易使民主政權被處於壟斷地位的多數所俘虜。任何一種壟斷對民主都是威脅。總之，沒有經濟上的能動性(activism)就沒有民主的共和國；沒有維持使所有的人都能受益的持續的經濟成長就不可能贏得人們對民主的愛戴，民主也就難以地久天長。所以穩定而長壽的民主國家都建立在牢固的自由市場經濟之上。

關於民主與資本主義是否自相矛盾這一話題爭論已久。贊同的理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跛足的，因為其經濟領域根本就不是用民主的方法來管理的。作者的反駁是，這一批評背後的預設就有問題，因為它假設民主的方法是應普遍適用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道德文化領域，就不能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確，有多數人曾經相信地球是平的，但這並不因為多數人相信而變成真理。即使在政府內部，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也不能完全用多數決定或民選的那套民主辦法來管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硬套在經濟上，必然會使經濟失去活力，從而使民主政治也失去了經濟的基礎。

## 多元的道德文化

政治自由要求有經濟自由，要求有道德文化自由，即選擇自己的信仰和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每項自由的存在都以另外兩項自由為保障，在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不存在的地方，道德自由是不能維持的。選擇自己的信仰和決定自己命運的

道德文化自由，同時也表現為信仰自由和信息及思想的自由流動，同時也是指道德和文化制度得以存在的自由。它表現為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

從直覺上講，一個國家最好能用一個思想來統一。體現這種思想的原則和理論要為所有的人信奉。然而，民主資本主義則是以多元的價值為基礎。古典自由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具有一種雙重的特性，即它們只認定某種政治經濟學說，但又使這種學說開放，同時並不否定其他學說存在的權利，並隨時準備妥協、準備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因為，價值是相對的，人類認識真理的權利是平等的、有限的，而真理又是不能強加的。職是之故，民主資本主義的道德文化體制注定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的和寬容的。

在民主資本主義一體的三位中，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使普通人達到更高的道德境界。過去的道德家們強調理想、目標和動機，而民主資本主義則強調結果，強調消滅飢饉、提高窮人生活水平的道德可取性。諾瓦克指出這樣一個悖論：越要取得較高的道德成就，就越要降低道德說教的調門，不去強調動機和目的。這就是所謂的「意外後果的法則」。若要取得滿意的道德成就，運用合理的自利比無私的奉獻要有效得多。這並不是說，利他不重要，而是說必須把利他放在自利的基點上。若是用利他來否定自利的價值，利他本身也就不名一文了。若是自利沒有價值，就等於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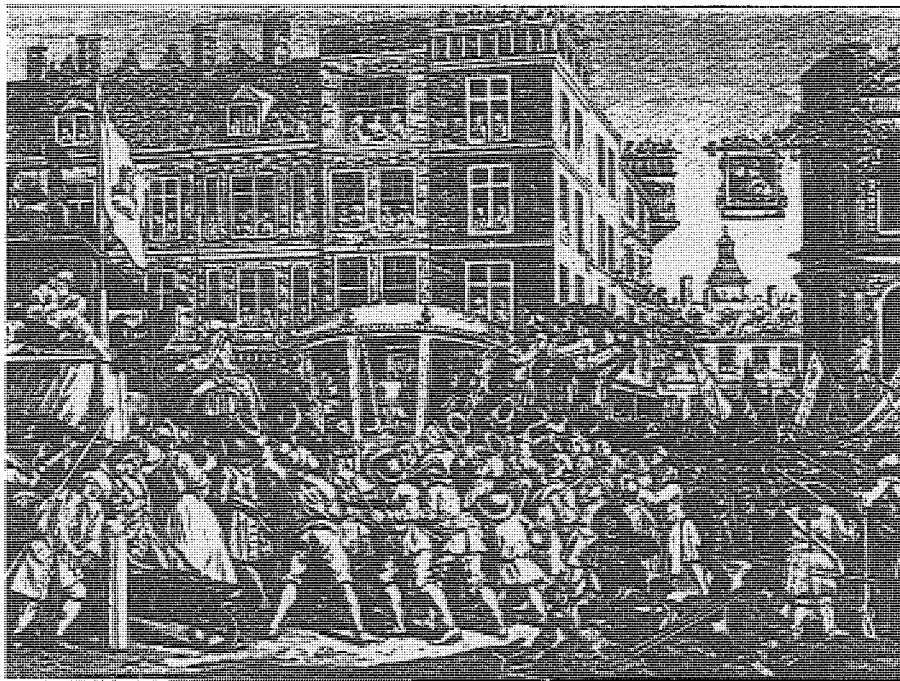
沒有價值的東西送給他人，因而，也就不會產生利他的效果。因此，人越自利越顯得利他可貴，人越利他就越要尊重自利。正是因為合理的自利是道德的基礎而不是全部，才使得宗教信仰必不可少。自利是創造力和英雄壯舉的源泉，但也不是人類事務的全部。這就是作者所歸納的民主資本主義道德體系中的自利觀。

對民主資本主義的指責之一是，如果這一制度真的是以多元的思想為基礎，豈不是讓人們在道德上的追求背道而馳嗎？不是在鼓舞人們去作惡嗎？儘管沒有寬容和動聽的詞語，這不是在搞道德放任，對壞良心作出不能容許的讓步嗎？諾瓦克承認，這些指責是對的。問題在於，若是把這種多元的思想基礎轉化成一元的、制定一個絕對一律的道德標準，並加以強制施行，那麼，它將比這種放任產生更為罪

惡的後果。

民主資本主義的敵人是加約束的、專橫的和過分集中的權力所造成的專制，因此，不能把權力交給任何一個人，不論他多麼高尚、睿智。除了要把經濟機構從道德中分離出來，還必須把新聞、教育、教會、自願性的結社從國家中分離出來。資本主義離開了培育其美德和價值觀的道德文化就不能繁榮，因為道德文化扮演着許多正當而必不可少的角色。因為它鼓勵人們自我約束、勤勉工作、遵守法律、眼光放遠、關心公益、富有同情心。

政治與道德的制度上的分化保護所有的人免受一元的權力的戕害。多元的道德文化體制有助於人類創造力的發揮。常識告訴我們，人類的創造力是泯滅不了的，最能解放人類創造力的制度肯定是最合乎人性的制度，因而也是最道德的制度。諾瓦克認為，民主資本主義



民主政治會否釋放暴民心理，蛻變成無政府狀態，最終以專制告終？

這個時代最令人驚訝的特徵之一是：人類的事務是由各種觀念支配着的，而且它們還大模大樣地凌駕在不容抹煞的事實之上。

正是這樣的制度。有人可能說它因為鼓勵自利而顯得不夠高尚，然而，它卻比扭曲人性、壓制創造力、帶來普遍貧困的極權專制高尚得多。有人指責說，民主政治沒有理想。這是事實，但諾瓦克反而以此為榮。因為在前民主資本主義的時代，各種文明所定的官方理想部門都比民主高，更不用說近兩個世紀各種激進主義的道德高調了。民主的社會的確沒有官方指定的「崇高」理想，更沒有極樂世界的藍圖。一切非民主的社會倒反而擁有許許多多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幻影」。非民主的社會只有官方的理想，而沒有個人的理想；民主社會正是沒有官方的理想，才為個人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留下了空間。

以往，民主資本主義視其精神傳統為理所當然，所以沒有感到迫切需要一個關於自身的理論。它似乎並不需要一個道德理論，一個關於精神生活的理論。觀念，雖然總是現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已獲得了比現實更大的影響力。作者敏銳地指出，這個時代最令人驚訝的特徵之一是：人類的事務是由各種觀念支配着的，而且它們還大模大樣地凌駕在不容抹煞的事實之上。更不用說這些觀念中有虛假的、行不通的，甚至有連官方的衛道士都不再信奉的。有些觀念極富有破壞性，十分殘忍，而且很不切合實際，但卻仍有很多文化精英對之忠貞不渝，因為這些觀念給他們帶來了很多的好處。有些人靠製造觀念和符號為生。這類人已完全被上述觀念的虛偽性和荒謬性所蠱惑，並被格外授權去把這些觀念強加給那

些不幸的人。這或許正是迫使作者構築民主資本主義精神的時代動機。

回過頭來看，該書的主旨是為了解決民主資本主義的價值危機，或者說，意識形態危機。儘管該書極富說服力，但是這種說服工作對信仰者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反對者卻依然固我，不予理會。該書還試圖解決基督神學與民主資本主義的關係，使兩者完全兼容，套用「三位一體」的概念就最能豁顯這一點。但潛在的問題似乎也正出在這裏。因為若是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太合拍，以致給人的印象是只有基督教才能與民主資本主義相配合，兩者是珠聯璧合，那麼，其他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與民主資本主義如何「搭檔」？在該書中，民主資本主義的道德正當性是來自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條。那麼，在非基督教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還那麼牢固嗎？再一想，倒也能理解，作者作為天主教徒，其主要任務當然是要解決基督教與民主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每種宗教和文化傳統都有其傳承者，上述的溝通工作對各個傳統的傳承者來說，是自己的「門前雪」，掃除工作當然要由自己來完成。

劉軍寧 1961年生，安徽舒城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從事當代政治理論研究工作。著有《權力現象》及學術政論文章多篇。